

西方政治文化视域下社会资本研究的三次转折

——以罗伯特·帕特南为例

张会芸*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社会资本”研究从社会科学的边缘晋升为主流，“社会资本”甚至成为公共讨论的常用术语，罗伯特·帕特南在其中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90年代初，政治学的知识话语自制度向治理转型，顺应这一趋势，社会资本经由帕特南从经济学领域引入政治学领域，为制度绩效提供了独特的解释进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帕特南借助翔实的数据全面评估美国公民社会的变化，并用“独自打保龄”一词形容社会资本的流失，成为新社群主义的理论代表。最近10余年间，帕特南渐渐摆脱“社会资本”概念的负累，同时延续“社会资本”无法尽表的敏感主题，关照宗教多元分化及社会阶层分化等宏观社会问题，针对性地倡导重建合众为一的美国文化。

关键词：社会资本；帕特南；政治文化；独自打保龄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the research on social capital has moved from the margin to the mainstream of social science professions, even “social capital” has turned into a commonly used term for public discussion, in which Robert Putna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arly nineties,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shifted 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 Swimming with the tide, “social capital” was imported from economics to political science by Robert Putnam providing a unique interpretation to “Government performance”. Since the later period of 1990s to the early 21st century, Robert Putnam made a

* 张会芸，法学博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外政治思想。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American civil society based on detailed data with the term “bowling alone” being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loss of American social capital. In recent ten years, Robert Putnam gradually realized the utilitarianism burden of “social capital” which made him intentionally get rid of the term. But he continues the existing theme of rebuilding American culture *e pluribus unum* that social capital focuses on, and explores other related topics such as religious pluralism and social class differentiation in depth.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Robert Putnam, Political culture, Bowling alone

社会资本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兴起的热门学术概念，其成熟形态最初出现于社会学领域，然而使其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升级成为研究风潮的正是罗伯特·帕特南。帕特南将社会资本理论从社会学引入政治学，经其修正，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视野超越狭隘的经济领域，转向社会领域，更从社会领域转向文化道德领域；研究范畴则实现了微观到宏观的过渡，超越“资本”单纯的功利维度，把凝聚和谐的状态看成社会发展的良善境界。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的 30 年间，罗伯特·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社会资本经由帕特南之手从社会学领域引入政治学领域，实现学科的跨越与概念的移植，其中以《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① 为代表。第二阶段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段至 21 世纪初，帕特南推动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走向体系化及全球化，其中以《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② 的影响最为突出。第三阶段为内核提炼与主题拓展的研究阶段，社会资本与宗教多元化、种族多元化及社会阶层分化等问题成为帕特南由社会资本理论延伸开来的新的理论关注点。

① Putnam, Robert, Leonardi, Robert & Y. Nanetti, Raffaella,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② Putnam, Robert,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一、社会资本的学科跨越与概念移植：重新发现“社会”

1993年，《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出版。该书基于意大利行政分权改革这一“政治自然实验”的机缘，以“为什么有些民主政府成功了，而有些却失败了”作为核心议题，探讨意大利南北部地区制度相近而绩效悬殊的原因所在，并最终诉诸以“公民共同体”（civic community）及“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为名的公民传统差异。《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面对老问题给出的答案不同于经济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的既有解释，它重新确认了“社会”的价值。甫一面世，《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因旧题新解的理论阐述收获赞誉无数，《经济学人》杂志甚至称此书的学术价值足以与托克维尔、帕累托和韦伯的著作齐名。时至今日，此书已被翻译为至少16种语言，在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都成为名副其实的“瞬时经典”^①。

（一）制度绩效与社会资本：经济学话语包裹政治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意识形态争论很大程度上被搁置。在民主制度成为政治共识的基础上，西方政治学出现“主义导向”到“问题导向”的一系列新变化，研究重心从“制度的选择与确立”悄然转向“制度的运转”，呈现出知识话语的转变，尤其针对“治理”（governance）的研究强势兴起。尽管缺乏统一的确认知^②，但相比以“制度”（government）

① 罗伯特·古丁（Robert E. Goodin）及汉森-迪特尔·克林格曼（Hansi-Diteer Kelingeman）指出政治科学研究的表现之一就是“瞬间即成经典”现象：一些图书一经出版便被众人关注，进而奉为经典；但他们质疑这些短时间内成为经典的著作是否能如旧有的经典一般存在永久的生命力。参见罗伯特·古丁、汉森-迪特尔·克林格曼编：《政治科学新手册》，钟开斌、王洛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8、20页。

② 治理理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罗茨（Robert Rhodes）详细列举了六种关于治理的不同定义。这六种定义是：1. 作为最小国家的管理活动的治理，指国家削减公共开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2. 作为公司管理的治理，指指导、控制和监督企业运行的组织体制；3. 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指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4. 作为善治的治理，指的是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5. 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指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6. 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它指的是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参见罗伯特·罗茨：《新治理：没有政府的管理》，杨雪冬译，《经济管理文摘》2005年第14期。

为核心的既有知识话语，治理研究表明政治与行政二分建构的理论空间趋于融合，于技术上亲和管理主义。

《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可算作政治学领域知识话语转向的典型代表。帕特南于1988年的文章中曾表明政治科学研究关注两个基本问题：“谁统治”及“怎么统治”，前者是过去几十年间政治学领域前沿的研究重点，后者因理解的混乱为多数政治学者不愿触及，而他希望弥补后一问题的研究空缺。^①从20世纪70年代起，以帕特南为首的研究团队耗费20余年时间跟踪记录意大利的地方民主化历程，其着意攻克的理论难关不再是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维巴（Sidney Verba）以及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人关照的民主制度构建，而意在追问：何以“政治运行的新途径”（即民主制度）摆在意大利所有的地区领导人面前，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运用“有效管理的新方法”。^②

帕特南突破阿尔蒙德等人将民主政治界定为选举性政治输入结构的局限，借用“制度绩效”使规范民主落地生根，从政治输出的成效出发量化民主，将“治理”的政治分析框架纳入对意大利民主制度的考评与分析中。《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指出评价一个民主政府，必须评论它对选民要求做出反应的状况，又必须评估它在管理公共事务方面的效率。简言之，民主政治的测评应体现在两个方面：政府管理效率及反应灵敏度。对此，帕特南设定了12项指标，涉及政府运作的全面性、一致性、持续性及回应性四个方面，以“制度绩效”将规范民主实证化。帕特南等人多年跟踪的经验数据表明，尽管地方分权式改革由中央政府统一推进，但意大利北部与南部的民主制度运行实践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北部地区走上了高效、稳健的民主道路，而南部地区的民主发展仍旧孱弱。

帕特南从既有文献中总结出学术界解释制度绩效差异的三种分析模式——制度模式、经济模式及社会文化模式。在否定了前两种分析模式的有

^① 参见 Putnam, Robert,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Culture: Some Puzzles about the Power of the Past,”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Vol. 1, No. 3, 1988, p. 221. 另可参见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页。

^② 参见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第57页。

效性后，帕特南将研究重心锁定于公民共同体的文化传统上。他从哲学争论的核心主题出发，将“公民共同体”归纳为公民参与（关心公共事务）、政治平等（互惠合作的横向关系）、团结信任与宽容、社团（合作的社会结构）；并将社团生活的活跃度、读报的几率、选举与公决投票率、特别支持票投票率（反应庇护—附庸关系的反向指标）设定为“公民共同体”的实证指标。针对制度绩效与公民共同体的经验数据统计分析发现，“地区政府绩效与该地区社会政治生活同理想的公民共同体的接近程度之间存在着不同寻常的吻合关系”，而且“公民共同体的解释力比经济发展的解释力更大，一个地区的公民程度越高，地区政府就越有效”。^① 继而，帕特南追溯公民文化传统在意大利南北部地区的巨大差异，他在纵向维度上联系历史，指出这种差异脱胎于悠久的历史环境，其传统甚至可追溯到近千年前的中世纪时期。截至此时，帕特南对制度绩效差异的解释，关于公民文化的哲学分析、历史阐述以及量化研究，均与社会资本无涉。

该书在终章引入“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以精巧的经济学话语进一步印证公民传统（或曰公民文化）对制度绩效的解释力。公民文化与制度绩效在统计学上存在强相关性，但历史悠久的公民共同体或者公民精神在规范逻辑上何以优化制度绩效？依托于帕特南精巧的理论改造能力，“社会资本”概念几乎是顺理成章地从社会学领域进入政治学领域，并与公民文化相结合，为这种统计的相关性提供了规范性解释。就表面来看，帕特南用绩效来比附制度运行并加以量化，行文中贴合经济学的话语表达来阐述政治问题，“社会资本”概念自带的资本逻辑跟功利视角恰与“制度绩效”——对制度的效率要求与产出要求——遥相呼应。更深一步，社会资本理论内在的集体行动逻辑支撑了公共精神与制度绩效的因果关系。

当前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可谓五花八门，但在理论源头的追溯上却保持着相当的默契。“社会资本”在整个20世纪被独立发现过7次^②，但作为学术概念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被系统阐释，学术界公认的三位

^① 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第112页。

^② 参见 Woolcock, Michael, “The Rise and Routinization of Social Capital, 1988–2008,”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3, 2010, p. 469.

创建之父分别为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及罗伯特·帕特南。在此之前“社会资本”多用以比喻而散见于不同领域，相互之间也缺乏传承关系。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研究自阶级分析的视角出发，独树一帜；罗伯特·帕特南与詹姆斯·科尔曼的研究则共属于美国政治科学的研究范畴，前者更是从后者那里借用并修正了“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在詹姆斯·科尔曼的分析中充当了改造纯粹理性选择理论的概念工具，他指出固定的社会交际网络有助于个体走出过度的经济人思维，避开以公地悲剧为象征的集体行动困境，进而更好地实现“自利”这一目的。^①科尔曼尝试将社会资本理论与集体行动困境的突破相结合，这一理论趋势最终在罗伯特·帕特南对其“社会资本”概念的转借中确定下来。

不同于霍布斯和威廉姆森依靠强权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方案，帕特南在借用“社会资本”集体行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最终认定不同地区间制度绩效差异的原因在于“社会”的强弱不一，即“强社会，强经济”，“强社会，强国家”^②，此处的“社会”即为公民共同体。在他看来，社会资本存量高的共同体内往往结社传统深厚且拥有高度的互信文化，从而更有助于克服“搭便车”的社会行动困境。相反，在低社会资本的社会共同体中，互不信任的社会文化、守望自利的社会规范、庇护-附庸的垂直社会网络，三者间相互影响，形成自我强化、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由此，低社会资本、低制度效率、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形成一种“永不合作”的稳定社会均衡。帕特南使用“社会资本”推动了政治学界从资源视角与产出视角对“社会”的政治价值重新进行功利化的审视，以灵活的政治学话语包裹了政治学研究，正式开启了社会资本从社会学向政治学领域的跨学科移植。

（二）历史选择固化理性选择：社会学要素的政治学转化

社会资本从社会学向政治学领域的跨学科移植，建基于“修正主义者”

^① 更为详细的阐述可参见周红云：《社会资本：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的比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4期。

^② 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第206—207页。

帕特南对科尔曼理论的精巧改动上。就社会资本而言,与科尔曼相比,帕特南的理解在凸显社会结构因素的同时,加入了社会网络内部生成的主观观念要素,如信任观念、利他精神及互惠规范,使社会资本概念囊括了与客观社会网络紧密相关的文化要素。

社会资本理论与政治文化研究的合流是政治科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关于社会资本研究的决定性差异。这种合流促使社会资本内在的经济学思维悄然转化。罗伯特·帕特南以“社会资本”为名挑起了政治文化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的遭遇战。政治文化研究与理性选择理论一直被视为政治学界行为主义流派中两种对立的理论,它们在人之本性的认定及理论架构上都存在针锋相对的立场和方法。理性选择理论以古典经济学中的个体理性观点为核心,预设经济动机是行为激励的稳定性元素,认为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短期利益的考虑,可有效阐释其政治行为及政治结构变迁等现象。政治文化研究则抛弃对人性形而上的预设,以阿尔蒙德为先锋的研究进路寄希望于从调研数据的综合归纳中发现相对稳定的大众行动取向及其缓慢变化,并求证不同文化类型对民主稳定等方面的影响。当前西方学术界对文化分析与理性选择分析的结合多试图将文化要素整合进理性选择的框架内,帕特南反其道行之,将理性选择理论的阐释进路纳入对文化的理解中。如前所述,帕特南首先从历史选择视角解释公民传统何以如此源远流长,进而借用詹姆斯·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来印证公民文化的政治影响力,政治学意味的公民文化与自带经济逻辑的社会资本合二为一。但这种融合并非一目了然,帕特南借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与道格拉斯·诺斯的理论对詹姆斯·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的修正阐述。^①

社会学领域既有的社会资本理论对于“文化”的理解相当狭义。社会资本比拟的“文化”产生于理性个体的反复博弈,狭义理解下的“文化”具有

^① 《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曾2次提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4次提及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而在文本注释中,道格拉斯·诺斯出现多达8次,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引注也有7次之多,两者的出现频次与詹姆斯·科尔曼几乎持平。罗伯特·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的引注中8次提及詹姆斯·科尔曼。参见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第301—315页。

高度的情境化色彩与组织封闭性特征，“文化”的生成被视为是有意识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公民文化或者政治文化对“文化”的理解截然不同。西方政治文化研究者尽管在政治文化的概念界定与方法论选择上分歧重重，但对文化的基本认知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任何一个要素被认定为“文化”，必然具有超越个体人格特质和态度倾向的整体性与稳定性——在横向空间维度上为普遍多数人所共享，在纵向时间维度上相对持久。在社会化过程中，尤其是早期社会化过程中，文化实现代际传递与自我增量，而在社会化的世代积累中，文化在时间的沉淀中获得稳定性与普遍性的特质。

帕特南以社会资本代表的经济学思维佐证公民文化的解释力，需要突破上述两种在“文化”理解的互不通融，糅合社会资本这一社会学要素与公民文化这一政治学要素。他一方面借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关于“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理论，填补了科尔曼未及言明的社会资本（即狭义文化）生成机制。^① 帕特南指出，个体嵌入到社会网络（尤其横向网状社会网络）中，在一定时间内反复社会交际，往往会鼓励短期利他意识与长期利己意识的结合，“正确理解的自利”意识以及互惠规范从中萌生。横向社会网络、互惠规范以及社会信任也因此同时被帕特南归为社会资本。与此同时，帕特南借助诺斯的路径依赖指出利他意识与互惠规范会在历史演进中陷入“路径依赖”而不断自我强化及自我积累。诺斯的“路径依赖”概念所要表达的核心观点就在于制度演化和变迁的累积特性，他指出植入文化的规范与习惯会由社会化实现代代相传，同时这一过程趋向于自我增量。帕特南在此意义上借用诺斯关于制度模式的自我增强理论解释了奥斯特罗姆基于理性选择的合作机制，也即情境性的“社会资本”何以在近千年间自我延续，与持久性的“公民文化”成为一体概念。《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由此发展出了新的理论方法，即所谓“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社会资本的概念基础上……”

^①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1990年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中并未使用社会资本这一术语，但她受到罗伯特·帕特南社会资本阐述的反向影响，在其后的文章中使用社会资本来表达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参见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社会资本：一种时尚还是一个基本概念？》，见帕萨·达斯古普特等编：《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多点》，张慧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Ostrom, Elinor,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Norm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4, No. 3, 2000.

将理性选择视角与历史选择视角结合起来”^①。

《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并非尽善尽美，其细节上的缺陷曾多受诟病，如其对意大利历史解读的过分主观化、制度绩效测定指标的效度不足等。然而，这本书整体的研究设计及内容布局却具备独特的开创性价值，尤其它重新确认了“社会”的价值，并将“社会”的解释力通过“社会资本”这一精巧的概念引回到政治学领域。与此同时，书中对意大利南北部地区公民文化传统的历史追溯，对社会资本的理论引介，以及对集体行动的分析阐述，通过不同的规范视角多层次解答了民主运作的成败问题。对此，美国政治文化研究的鼻祖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赞誉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研究是政治文化研究复兴的经典代表，他指出帕特南依赖于意大利20年的政治改革，综合采用社会调查、精英采访、案例研究等不同方法，并辅之以博弈论佐证，为政治文化研究奠定了新的方法论基石。^② 大卫·莱廷（David Laitin）也称帕特南的研究中综合使用了（半）正式理论和历史（环境）分析和统计的“三角测量”（triangulation）方法，一方面结合历史背景知识提供了可能性的解释，另一方面以博弈论与统计数据相佐证，达到了“令人惊异的突破”，他甚至断言这种“三位一体应该成为未来比较政治学中政治文化研究的标杆”^③。

二、社会资本的实证发展与理论调整：独自打保龄？

《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问世后，罗伯特·帕特南将研究目光从意大利转回了美国。1993年底帕特南发表文章《繁荣的社区：社会资本与公共生活》，这篇文章主要在阐述社会资本理论解释意大利问题上的运作逻辑，但结尾将社会资本与美国问题——“美国病”联系在了

① 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第17页。

② 参见Almond, Garbiel, “Forewords,” in Richard J. Ellis & Michael Thompson (eds.), *Culture Matters: Essays In Honor of Wildavsk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③ Laitin, David D., “The Civic Culture at 30,”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9, No. 1, 1995.

一起。^①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帕特南主要关照美国正在面临的公民社会衰落。他通过对20世纪下半叶美国历史的数据考察，全面评估了美国公民社会也即社会资本的变化状况，并用“独自打保龄”一词生动形容出社会资本的流失。1995年帕特南在《民主》杂志上发表文章《独自打保龄：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正式将研究视角转向美国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这篇以危机为基础论调的文章使得帕特南在短时间内声名鹊起，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甚至因此邀请帕特南做客白宫。以该文作为研究起点，帕特南创立了赛格瓦鲁论坛（Saguaro Seminar）以广纳贤士，共同讨论如何提升社会资本的量化研究、探索社会资本重建的方法。^②2000年以《独自打保龄：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为基础的同名书籍《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出版，帕特南再次在世界范围内引领了学术界对社会资本量化研究的兴趣，并开创出社会资本量化的“帕特南式工具”。^③2000年的同名书籍是帕特南自1993年来潜心进行社会资本经验研究的阶段性定论之作，同时也成为他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继《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后的又一“瞬时经典”。

（一）历史选择的隐退及群际接触的带入

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研究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之后急速地转向实证研究，其理论逻辑也发生了鲜明的逆转。《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对意大利制度绩效差异的讨论中，帕特南理解的社会资本依托于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在近千年间长期延续、自我积累，最终实现了历史选择对理性选择偏好的固化，使得社会资本理论与公民文化研究合二为一。与之相对应，实证研究转向后，

① 参见Putnam, Robert,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The American Prospect*, No. 13, 1993.

② 该论坛的研究成果于2003年集结成书出版，即为《在一起更好：重建美国社区》（*Better Together: Restoring the American Community*），同时以此为名的网站成立，系统介绍相关研究成果，及时更新相应的研究进度。

③ 帕特南量化社会资本设定了14项指标，分别为政治参与、公民参与、宗教参与、工作联系、非正式社会联系、利他主义、志愿活动、慈善活动、互惠、诚实、信任、小型团体、社会运动、互联网。

一方面，社会资本不再如《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中一般作为公民文化政治解释力的补充分析工具，而直接变身为“公民文化”的代名词，两者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另一方面，行为主义革命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定量研究可采纳的数据局限在几十年时间内，基于此呈现出来的社会资本兴衰变化成匆匆一代人的事情。换言之，社会资本的实证转向抽离了至关重要的历史选择视角，脱开了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解读。社会资本自带的封闭性、狭义的“文化”理解与政治文化要求的普遍性、广义的“文化”理解因此在其理论内部形成了更为直接的冲突。社会资本介入政治文化研究（或曰社会资本的文化主义转向），迫切地要求社会资本对文化固有的狭义性理解转换为普遍性理解，而历史选择视角的隐退迫使帕特南寻找新的理论突破点以整合狭义“文化”与广义“文化”，重新确认“社会资本”代表着惠及全社会普遍多数人的一般性及持久性文化要素。

缺失了历史选择视角与路径依赖理论的支撑后，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及《在一起更好：重建美国社区》等一系列著述中尝试引入社会学的“群际接触理论”，认为寻回公民共同体精神的关键在于重建特定类型的社会资本去引导人们超越自己的社会、政治和专业背景，去和不同类型的人交流联系。社会学理解下的社会资本理论始于特定的社会网络分析，本意在于弥补理性选择理论过度强调“经济人”假设造成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困境，其所指的“文化”（或规范）呈现出鲜明的组织“嵌入”（*embedded*）特色。政治学界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独立于情境之外的分析概念，表现为种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价值，呈现出相对于特定组织的“脱嵌”特色。群际接触理论作为西方社会心理学为解决群际冲突问题而发展出的理论体系，关照不同群体间的接触交往对公民共同体的良性影响。帕特南正是借用群际接触理论的这一节点为社会资本理论走出狭小的“嵌入”格局、实现“脱嵌”提供了突破口。

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中对外联型（*bridging*）组织与内聚型（*bonding*）组织的区分与群际接触理论相呼应。其中，内聚型组织对应于格兰诺维特的强连带，它以关照自身成员的内部利益

为重点，在成员构成上往往具备高度的同质性，有助于培养团体的内部忠诚感，同时对外来者的加入表现出明显的排斥性。外联型组织则突破内聚型组织特有的封闭特性而目光向外，包容与接触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种族背景、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帕特南寄希望于外联型组织内的异质性成员在反复交际中形成成员间的良性认知以及组织内的互惠规范，进而他们将这种认知或者规范扩展至社会中的其他同类型人，从而实现互惠规范及信任态度由内而外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①，并进一步波及宏观政治的认知、态度、评价，影响到民主政治的绩效。帕特南认为外联型组织的溢出效应与社会心理学的群际接触理论异曲同工，个体与外群体成员接触越多，越能减少群际交流中的偏见认识，缓解群际接触的焦虑情绪，促进个体对外群体的共情能力，最终改善群际关系。^②

如此理解下的社会资本在《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的实证研究中被具象为广泛的、频繁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参与与社会交往形式——政治参与、公民参与、宗教参与、工作联系、社会联系、志愿与慈善活动等，以及这些群际接触产生的社会文化性影响。帕特南进而以系统的量化数据描绘出美国人社会资本普遍的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帕特南也考察了小团体活动、社会运动和互联网等新兴社会组织与参与形式呈现出的不同寻常的上扬势头。对此，他指出 20 世纪后三分之一的时段内美国人已经渐渐疏远了社群生活，虽然新兴组织与活动代表着一定的反向潮流，但终究无法改变社会资本的下降横扫美国社会的事实。

（二）质疑社会资本下降论：独自打保龄？

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现代化的迅猛发展给予生活种种影响，波及社会的各个角落，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相对紧凑的社群生活；而强调个性的科技

① 所谓溢出效应指一个组织在进行某项活动时不仅会产生活动预期效果，还会对组织之外的人或社会产生影响。溢出效应的提法最初来自经济学，主要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往往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引起当地生产力进步。溢出效应一经提出便因为相对形象的描述而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外部效应的阐述，如技术溢出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及基金溢出效应等。

② 参见 Pettigrew, Thomas F. & Tropp, Linda R., "How does Intergroup Contact Reduce Prejudice? Meta-analytic Tests of Three Mediator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38, No. 6, 2008.

更新与发展更是迅猛，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进日常生活，使得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倾向加剧。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等一系列著述借助翔实的数据，直观地传递出个人主义的过度发展及相应的危机，并因此迅速发展成全球社会科学领域的热门话题。然而，帕特南以《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为代表的作品尽管在公共领域赞誉不断，于学术界遭受的质疑却多于赞誉，有批评者甚至明确指出这本书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著作而言基本上算是失败的。^① 几种关键质疑直指帕特南断言美国社会资本大幅下降过于草率。

第一种质疑关照帕特南所言的下降型指标，指出过分的先入为主导致了帕特南在数据使用上存在选择偏见。首先，于纵向时间轴上，限于政治科学研究的兴起年限，帕特南的数据来源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左右，因而他将社会资本的绝对高值设定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批评者认为这一时段有其特殊性，忽略这种特殊性是帕特南结论偏差的关键肇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彼时的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它避开了血腥战争的残酷与极权主义的恐怖，整个社会弥漫在歌舞升平的氛围中，民众中普遍存在国强民富的自我认同，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甚嚣尘上；而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僵持更是营造出微妙的战时心理状态，为美国大规模、普遍性的爱国主义及集体主义情感提供了成长的外部环境，激励着各类公民参与与社会交往的爆炸式增长，社会资本的各类指标因而呈现出高涨状态。由此，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美国社会资本持续的下降趋势可能仅仅是从特殊时期回归到正常水平，质疑之声认为帕特南对这一特定时段的数据选定造成了近几十年美国社会资本下降的误导性表象。^②

在横向的经验测量上，帕特南将社会资本具象化为广泛且频繁的正式与

① 参见美国经济学家本·法恩对于社会资本研究的解构：Fine, Ben, "Social Capital In Wonderland: The World Bank Behind The Looking Glass,"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8, No. 3, 2008; Fine, Ben, *Theories of Social Capital: Researchers Behaving Badly*, New York: Pluto Press, 2010; Ben Fine, "Social Capital for Africa?" *Transformati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Southern Africa*, Vol. 53, 2003.

② 罗伯特·乌思诺：《美国：沟通特权群体与边缘化群体？》，见罗伯特·帕特南编：《流动中的民主政体——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演变》，李筠、王路遥、张会芸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0页。

非正式的社会参与形式以及这些群际接触带来的文化影响，即政治参与、公民参与、宗教参与、工作联系、非正式社会联系、志愿活动、慈善活动、利他主义、互惠、诚实、信任、小型团体、社会运动及互联网 14 项指标。除去最后 3 项（小型团体、社会运动及互联网）存在持续上升的逆反趋势外，其余的社会资本指标均显示出大体一致的下降走向。然而，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埃里克·尤斯拉纳（Eric M. Uslaner）等人重新分析社会信任（即互惠、诚实、信任等指标）在几十年间的发展趋势时均发现，美国的社会信任度在几十年间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他们由此质疑帕特南的特定结论来源于对定量数据的阉割式使用。^①

针对前述质疑，帕特南在其后主编的《流动中的民主政体——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演变》^②中将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推向全球，同时尝试推进各项指标测量的统一化与精准化。《流动中的民主政体——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演变》一书集合各国知名学者，研究对比英、美、法、德、西班牙、瑞典、澳大利亚、日本 8 国的社会资本演化状况，客观上规避了社会资本下降是美国例外论的指责。但帕特南对各国的研究结果分析后发现只有选举投票率、党内公共参与、工会参与、教堂出席率 4 项指标确实于最近几十年间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相对幅度较大的下降趋势，各国的人际信任水平一般保持不变或起伏不大。^③基于这些研究，帕特南改变了对社会资本下降这一变化趋势的绝对性判断，认为社会资本是否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实难定论。

第二种质疑认可帕特南在数据收集方面的努力，但调转帕特南经验分析的侧重点，指出社会资本整体上并未下降，而是面临转型。如前所述，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中指出存在与“社会资本下降”趋势逆向而行的几类组织形式——小型私人团体（如读书会、谈心会、自助会）、一系列新社会运动以及互联网虚拟社区。帕特南认为这些组

① 参见埃里克·尤斯拉纳：《信任的道德基础》，张敦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 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严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② Putnam, Robert (ed.), *Democracies in Flux: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③ 参见罗伯特·帕特南编：《流动中的民主政体——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演变》，第 382—390 页。

织形式无法有效推进不同群体间的良性接触以有效地培植共同体精神，因此被以无甚重要的“反趋势”待之。帕特南认为小规模私人团体因兴趣而起，往往同质性过高、异质性较低，能否被视为外联型社会资本，是否具备群际接触效应存疑，对此帕特南指出这些组织“并不像很多支持者希望的那样能够有效地培植共同体”^①。而新社会运动多因事主导，变迁迅速，组织形式上倾向于采取规模小、流动快的开放形式，尤其偏爱游行、请愿、静坐等非常规的直接民主参与，这样的新社会运动速起快结，缺少定期的互动频率，难以培育出稳定的社会信任规范。第三类互联网虚拟社区，在帕特南看来，比拟人与人的面对面交流可谓无稽之谈，虚拟世界的匿名性和流动性反而在加剧交往的散漫性，抑制共同体精神及社会凝聚力的形成。在更深入的解释中，帕特南指出同质互动的小型组织、难觅真人的网络交际及因事主导的社会运动这些“反趋势”实际上代表着“社会资本的私有化”趋向，即“社会资本”演变为个体的私人事务，社会性大为降低，其潜在的负面结果就是“越新颖的形式可能越自由却越不团结”。^②

以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为代表的学者恰恰重视分析这些反趋势。他们运用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正在经历自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转型，基于此，大众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例如，英格尔哈特提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公民的价值观念正在经历一场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悄然转变，其中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经济和物质安全的优先性，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将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视为优先目标。^③英格尔哈特认为，价值观变迁使得个体进行政治参与与社会交往的形式大有不同，帕特南斥之为“社会资本私有化”的这几种“反趋势”恰恰是“自我表现价值观”变迁的表现，这些新型组织与社交形式逐渐取代传统的党派参与与工会参与，并不意

① 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刘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

② 参见罗伯特·帕特南编：《流动中的民主政体——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演变》，第390—391页。

③ 参见 Inglehart, Ronald,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44;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第206—221页。

味着社会资本的衰亡，相反是其转化的明证。^① 英格尔哈特进一步指出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研究受制于社会信任与互惠规范培育这一潜在的理论任务，与群际接触理论相关联，侧重分析组织参与的外在形式，进而会过分注意社会资本指标下降的表象，不能深入分析内在动因；同时“社会资本下降”的主观臆设更使得理论本身带有浓重的怀旧色彩，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新兴事务深入研究的兴趣。^②

可以说，因帕特南异军突起的社会资本研究是托克维尔命题的追随者。阿列克西·托克维尔在帕特南的著述中占据极重要的位置^③，甚至被人称为“新托克维尔主义”（Neo-Tocquevillianism）。因笃信托克维尔对杰克逊时代美国的结社精神与民主成功的观察，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研究实际上将“社会”二字浪漫化了，这种浪漫化意味着对社会网络过高的规范性期望，甚至因此干扰了其对社会现实的实证分析。但无论如何，《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生逢其时，社会资本概念也借力一跃而起，同“全球化”一词并列成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仅次于“政党”的热门学术词汇，迎来高涨的全球性研究热潮。

三、社会资本的内核提炼与主题拓展：聚焦社会分裂与团结

社会资本是融合经济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的跨学科研究，不同学科取向间的内在龃龉始终存在于社会资本理论内部。其中概念分歧的丛林状态更成为研究展开的首要障碍，它蔓生出其他递增性的研究困境，阻碍了社会资本理论继续向前推进。这一问题在帕特南的著述中尤为明显，被视为社会资本

① 参见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张秀琴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Inglehart, Ronald & Welzel, Christian, “Political Culture,” in Daniele Caramani (ed.), *Comparative Politics (Thir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85-299。

② 参见 Inglehart, Ronald & Welzel, Christian,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47；Inglehart, Ronald & Welzel, Christian, “Political Culture,” in Daniele Caramani (ed.), *Comparative Politics (Third edition)*, pp. 285-299。

③ 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提及托克维尔 14 次，而 2000 年的《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则多达 18 次。

“核心代理人”的帕特南也没能构建出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最近10年间，帕特南渐渐摆脱“社会资本”概念的负累，重新提炼自身的理论关注点，拓展相应的研究主题，但他的作品中始终维持了一以贯之的核心，即在制度解释模式与经济解释模式的夹击下重新找回“社会”的一席之地，为原子化、碎片化的社会现实奏鸣警钟。

（一）社会资本内核的重新提炼：褪去“资本”外衣

帕特南在政治学领域创生社会资本时意在重拾“社会”在政治解释中的价值，他将社会资本等同于“公民共同体”，视社会资本为公民社会的文化维度或粘合剂。在帕特南笔下，社会资本的理论气质类似于托克维尔的“心灵习性”或爱德华·班菲尔德的“社会气质”（ethos）^①，以此来填补公民社会脆弱的伦理观，或如罗伯特·贝拉所言，逆转公民社会的空洞化^②。在此意义上，社会资本在哲学意涵上更贴合桑德尔、泰勒及麦金泰尔等人的社群主义理念，也因此被冠以“新社群主义”之名。^③然而，“社会资本”却是双刃剑。一方面，得益于“资本”二字，社会的价值与功用被学术界重新挖掘；另一方面，受制于“资本”二字，社会资本理解的分裂之势愈发明显。

首先，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观念型社会资本走向分流。社会学理解下的社会资本“嵌入”到特定社会网络中，通过功利视角审视特定社会网络抑制机会主义产生的价值所在，侧重阐释社会网络的重要性。帕特南将社会资本嫁接到政治文化研究中，升华为一个社会的普遍性特征，脱嵌意义上的社会资本越发像是“文化”的另一种表述。具体阐述中，帕特南的社会

① 参见 Banfield, Edward,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8, Chap. 8.

② 参见罗伯特·贝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周德明、翁寒松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③ 参见 Jackman, Robert & Miller, Ross,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 1998; van Deth, Jan W., “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Social Capital, Democracy, and Citizenship,” Modified paper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EURESCO Conference “Social Capital: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xeter, United Kingdom, 2001, pp. 15-20; Portes, Alejandro & Vickstrom, Erik, “Diversity, Social Capital, and Cohes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37, 2013; Walters, William,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Sociology: Re-imagining Politics?” *Sociology*, Vol. 36, No. 2, 2002.

资本概念一方面欲沿袭其社会学形式，偏重于以社会关系理解社会资本；另一方面也试图杂糅进普遍性的社会文化要素。《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将社会资本明确为“互惠的规范和公民参与的网络……一个继承了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自愿的合作更容易出现”，其中信任与规范被放置于首位。^①在《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中，帕特南则重新对社会资本要素进行排位并以内生逻辑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即“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上个人之见的相互联系——社会关系网络和由此产生的互惠和规范”。而后在文章《社会资本的测量与结果》中，帕特南却明确“同意迈克尔·伍考克关于社会信任不是社会资本定义的一部分的说法”，认为“信任仅是社会资本紧密相关的结果”。^②受制于“资本”的学科视野差异，社会资本的结构型理解与观念型理解孰轻孰重在帕特南的阐述中时有冲突。

同样受制于“资本”一词，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解还面临另一分歧，即积极社会资本与消极社会资本的纠葛。早期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带有明显的功能主义色彩，玛格丽特·列维（Margaret Levi）、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米歇尔·弗雷（Michael Foley）及鲍勃·爱德华（Bob Edwards）等人认为这种功能主义的界定方式使社会资本的公共性与正面性被过度美化，遮蔽了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③对此，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回应，自己“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中确实忽略了社会资本反社会的可能性”，但此后一直在努力区分积极社会资本与消极社会资本以规避这一困境。^④然而，“资本”一

① 参见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第190—206页。

② Putnam, Robert, "Social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onsequences," *Isuma: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cy Research*, Vol. 2, 2001, p. 42, retrieved at 6 May 2013 from http://www.isuma.net/v02n01/putnam/putnam_e.pdf.

③ 参见Levi, Margaret, "Social and Unsocial Capital: A Review Essay of Robert Putnam's Making Democracy Work," *Politics & Society*, Vol. 24, 1996; Portes, Alejandro & Landolt, Patricia, "The Downside of Social Capital," *The American Prospect*, No. 26, 1996; W. Foley, Michael & Edwards, Bob, "Escape From Politics? Social Theory and The Social Capital Debat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40, 1997; W. Foley, Michael & Edwards, Bob, "Is It Time to Disinvest in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Vol. 19, 1999.

④ 参见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第20页。

词自带的功利导向与产出思维实际上使得这种努力未见多大效果，而帕特南将社会资本下降定性为危机的论断实际上也暗示着社会资本的积极形象。社会资本的正负效应问题在社会学与经济学领域中极少成为争议所在，因为社会学与经济学的社会资本多被理解为对个人有益的人脉关系，相关研究甚少触及外部性（externalities）的问题。帕特南将社会资本研究搬入政治学领域后恰恰强调社会资本对宏观政治的资源意义，核心关照社会网络的外部性。政治学领域的社会资本研究如果不能清晰定位核心要素的宏观特质并以此为前提，容易造成以低层级的分析单位肢解开来解释宏观政治运作的层次谬误^①，进而难以明确定位所谓“社会资本”之于宏观社会的外部性有益还是有害。简言之，借由资本这一“新衣”，社会资本所指称的种种“旧物”在理论界重焕新生，再受关注；但同样受缚于这一“新衣”，社会资本的概念被动地受限于理性算计与功利审视，反而模糊了社会资本的真正意涵。

面对直指社会资本理论的一波波批评，在《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后的研究中，帕特南渐渐褪下“资本”这一外衣，尝试廓清社会资本的社会学理解对其理论阐述造成的种种束缚。他将社会资本的过分宽泛及相对混乱的界定逐步收缩为“社会凝聚”（social cohesion），对应社群主义的哲学阐释，专门针对合众为—的美国梦及多元分化的现实展开研究。

2007年帕特南发表的《合众为—：21世纪的多元化与共同体》^②可被视为其社会资本研究的分水岭。该文指出多元化的美国社会本质上是—以差别性作为特色的多元社会，但以差别性—立基的小群体抱团的行事规范成为共同体凝聚与—团结的关键阻碍，由此帕特南意图重新唤起美国立国之初的“大我”意识——“*E Pluribus Unum*”（合众为—），号召多元化社会的凝聚力重建。

① 所谓层次谬误指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特别是三段论式的逻辑命题中，作为前提的分析单位与作为结论的分析单位之间脱节：用高层次的分析单位做分析调查之用，以低层次的分析单位作结论；或用低层次的分析单位做调查得出高层次分析单位的论断。层次谬误或者区位谬误原本由社会学家威廉·罗宾逊（William S. Robinson）于1950年最先提出，其核心所指就是1950年前个人数据相对缺乏的情况下，社会学者以地区或集体的汇总数据推论个体行为的错误做法，罗宾逊认为这种做法错置了作为证据与作为结论的分析单位。这种谬误又被译为生态学谬误（ecological fallacy）。

② 参见Putnam, Robert, “E Pluribus Unum: Diversity and Commun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The 2006 Johan Skytte Prize Lecture,”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Vol. 30, No. 2, 2007.

这篇文章对“社会资本”一词的使用频率大幅减少，间或以社会凝聚或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代称，开始尝试摆脱社会资本理解上狭义的社会学牵绊。更为明显地，帕特南承认他在《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中对外联型与内聚型进行组织类型区分的理论努力可能无效。他指出外联型组织与内聚型组织的参与并非非此即彼的对抗关系，一般情况下积极参与内聚型组织的个体往往也是外联型组织的活跃分子，两者更多地呈现为强-强关系。此前帕特南依赖群际接触理论，亲外联型组织，斥内聚型组织，希望以此化解狭义社会资本与宏观政治文化的龃龉。《合众为一：21世纪的多元化与共同体》较之帕特南的既有观点存在不同，它尝试走出自资本视角审视社会网络的狭小格局，不再紧盯各类社会组织或参与的外在形式，不再单纯地寄希望于理性的个体交往营造出宏观的社会和谐，而从更为宏观且复杂的宗教、种族及阶层等多元分化的历史与现实考量社会凝聚力的起落。^①

2007年后的帕特南甚少使用“社会资本”，但却更为贴近移植“社会资本”概念时的理论初衷：重新发现社会，唤起共同体精神。帕特南近年来的作品——《美国恩典：宗教何以使我们分裂与团结》与《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可以算作是对以《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研究的扩展或完善，它们均致力于揭示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警示社会团结的价值，延续着社会资本研究的现实与学术关切。

（二）社会资本主题的拓展完善：多元分化与合众为一

2012年帕特南与大卫·坎贝尔合著的《美国恩典：宗教何以使我们分裂与团结》出版。这本书重点描绘了美国宗教多元化（religious pluralism）的历史沿革与宗教极端化（religious polarization）的现今形势，着重强调了宗

^① 此文发表后，以种族同质性寻求国家凝聚力的多元文化主义批评纷至沓来，尽管帕特南着意反驳，但其理论抛弃了对群际接触的乐观预期，对以社群为基础的排他性规范向普世性转化保持低期望值，这些均使得帕特南的回应显得有些苍白。参见 Bartlett, Tom, “Harvard Sociologist Says His Research Was ‘Twisted’,” online posting at 15 Aug. 2012 to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retrieved at 14 Jan. 2014 from <http://chronicle.com/blogs/percolator/robert-putnam-says-his-research-was-twisted/30357>。

教极端化对共同体生活及社会凝聚所产生的负面作用。《美国恩典：宗教何以使我们分裂与团结》的研究主题是帕特南社会资本研究的重要继承，他曾直言“集体崇拜的信仰团体是美国社会资本最为重要的宝库”^①；在内容上更是对《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中“宗教参与”一章的详述与扩展。

《美国恩典：宗教何以使我们分裂与团结》从20世纪性解放运动说起，以翔实的数据与充分的资料表明，美国人在过去的50年间于宗教信仰上日益分裂为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虔诚的信教徒和彻底的非教徒，宗教立场的温和中立派大幅缩水。帕特南指出摩门教（Mormon）、黑人新教（Black Protestantism）、新教福音派（Evangelical Protestantism）是美国虔诚度最高的宗教教派之一，它们的追随者在过去几十年间不断增加；居于虔诚度坐标中间位置的主流新教（Mainline Protestantism）及天主教（Catholic）则面临信徒的不断流失。同时，越来越多宗教态度暧昧的美国人选择从虚伪信教中出走，变为彻底的无神论者（The Nones）。另一方面，宗教立场的表达更是针锋相对甚至水火不容。帕特南指出，美国宗教谱系上越趋向虔信与不信两端的声​​音越乐于表明自己的立场，乐于现身公众前引领舆论，和谐宽容的观点由此越来越难发其声。对此，帕特南以宗教极端化（religious polarization）加以总结，进而警示宗教极端化正在使宗教多元化的美国趋向深层次的分裂，导致社会凝聚与和谐的持续倒退。^②针对这一问题，他寄希望于宗教联结（religious bridging）^③，以宗教观点的交流、宗教立场的流转来达到不同宗教及不同教派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宽容共存，其中最佳的途径不外乎不同信仰者间的通婚（interfaith marriage）。2012年的《美国恩典：宗教何以使我们分裂与团结》专注于美国人宗教立场的极端化展开研究，从更为宏观的视野解读美国宗教状况的当前面目，号召美国人在宗教观念上彼此宽容以实现相互的和平共处，维持美国宗教多元化共生并存的格局。

① 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第62页。

② 参见 Putnam, Robert & Campbell, David, *American Grace: How Religion Divides and Unites U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2。

③ 参见 Putnam, Robert & Campbell, David, *American Grace: How Religion Divides and Unites Us*, p.526。

2015年帕特南出版新书《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以阶层分化与隔离的残酷现实揭示出年轻一代人延续美国梦的危机。“美国梦”并非专业的社科术语，而是美国人诠释生活理想的共识性名词，指在美国这片国土上个人只要努力不懈地奋斗终能获得美好生活，其暗含的重要前提即美国社会机会平等且经济自由。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中锐利地捕捉到美国社会的动态变化，进而颠覆了美国梦这一虚幻的“神话”（帕特南语）^① 想象。帕特南从自身经历入手，并借助大量的案例及数据指出美国的阶层差距（class disparities）在过去几十年间明显拉大，处于下层社会之人面临着机会日益被削弱的现状，而上层社会的资源却不断膨胀，两个群体间的机遇落差（opportunity gap）持续扩张。在此前提之下，决定个人成功的因素已非单纯的个人奋斗，取而代之的是其所在的社会阶层或曰其父母所在的社会阶层。

《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是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研究的主题延续，也是帕特南对其社会资本研究的重要完善。帕特南的新书《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否定社会团结或社会融合文化的培育场域只能被局限于社会网络，而将家庭引回到研究范畴之内。帕特南早期的社会资本研究尤为强调“社会网络很重要”，能够抗衡专制的“中间结构”（孟德斯鸠语）或“结社艺术”（托克维尔语）是帕特南关注的核心。对于家庭，帕特南认为家庭成员间的同质性过强、异质性过弱，成员彼此间的交往有助于和谐家庭氛围，却无助于增进不同群体间的彼此了解及融洽社会关系，家庭由此被抛出其理论视野之外。针对这一观点，质疑之声颇多，家庭尤其儿童及青少年的家庭生活是否应纳入社会资本的讨论曾一度成为研究者们争议的焦点。戴特林德·斯托利（Dietlind Stolle）对此曾指出“社会资本研究的假设与政治社会化研究的成果存在确实实的潜在冲突”，她认为一个社会文化氛围的养成实质上更仰赖代际间的社会化积累，个人在儿童与青少年时期的家庭社会化是一种“深度习得”，往往使个体人格定型。因而她倡导“普遍性价值如信任的研究需要我们将视野移出志愿社团的范畴”，重新在社会资本研究中引

^① Putnam, Robert,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5, chap. 1.

入青少年的家庭与社会生活。^①

正如福山对《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所做之评价，这本书中帕特南意识到强大的家庭之于美国的关键性在于它是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的孵化器，人们不可能不提及家庭的衰落而妄谈社会资本的流失。^②《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指出工业化退潮引发蓝领阶层甚至中产阶级工作的流失，而在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过程中，家庭的衰落随之伴行，未婚与离异家庭大幅增长，吸毒和犯罪越发猖獗，这样的家庭环境无疑使得这一辈人的后代们前途惨淡。帕特南通过经年累月的社会科学调查表明家庭结构对孩子的人生结果至关重要，他指出早期的儿童激励、适当的角色榜样、稳定的家庭期望，这些都是个体实现向上流动所必要的背景。

这两部作品尽管对“社会资本”一词的提及寥寥无几，但与《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甚至《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存在一以贯之的理论关切。帕特南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研究始终忧心社会的碎片化，倡导共同体的重建。1993年《使民主运行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寻找造成意大利南方和北方之间制度差异的根源，最终归结为有无“公民共同体”的传统差异。2000年的《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对各种指标所展示的美国人社会参与能力和社会信任状态的稳步衰落表示出担忧，甚至以“美国共同体的衰亡与复兴”为题直表胸臆。至此，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受制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将社会资本研究局限在各类繁杂的社会参与形式之上——政治参与、公民参与、宗教参与、工作联系、社会联系、志愿与慈善活动等，始终无法更宏观地审视美国种族多元化格局、宗教多元化格局以及阶层割裂对共同体精神的影响。后社会资本时代的《美国恩典：宗教何以使我们分裂与团结》及《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因摆脱“社会资本”一词的

① 参见 Stolle, Dietlind & Hooghe, Marc, “The Roots of Social Capital: Attitudinal and Network Mechanisms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Youth and Adult Indicators of Social Capital,” *Acta Politica*, Vol. 39, 2004; Stolle, Dietlind & Nishikawa, Laura, “Trusting Others - How Parents Shape the Generalized Trust of Their Children,” *Comparative Sociology*, Vol. 10, 2011。

② 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书评》，2015年3月28日（<https://ptext.nju.edu.cn/c4/12/c13356a246802/page.htm>）。

束缚，也摆脱了社会资本跨学科移植的区位谬误风险，它们以充分详实的资料与平易近人的文字延续着“社会资本”一词无法尽表的敏感主题，更为自如也更锐利地揭示着美国社会的动态变化，针对性地倡导重建合众为—的美国文化。